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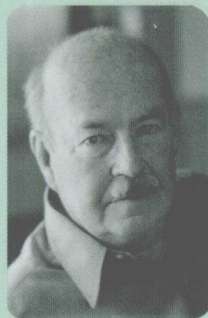
CAMBRIDGE

未名传记图书馆·社会学名家思想评传

帕森斯 学术思想 评传

Talcott Parson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德]乌塔·格哈特 (Uta Gerhardt) 著 李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帕森斯 学术思想 评传

帕森斯学术思想研究
——以《社会行动理论》为中心

作者：[美] 詹姆斯·H. 柯林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未名传记图书馆·社会学名家思想评传

帕森斯 学术思想 评传

[德]乌塔·格哈特 (Uta Gerhardt) 著 李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24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 / (德) 格哈特著; 李康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0

(未名传记图书馆·社会学名家思想评传)

ISBN 978-7-301-15864-7

I. 帕… II. ① 格… ② 李… III. 帕森斯, T. (1902 ~ 1979) — 社会学 — 思想评论
IV. C91-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1243 号

Talcott Parson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first edition, EISBN 978-0-521-81022-7 by Uta Gerhardt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书 名: 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

著作责任者: [德] 乌塔·格哈特 著 李康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864-7/C · 053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5.75 印张 48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如果你认为，对于这些东西，乍读之下即可理解，那可要小心了。
你会领悟一二，但要真正理解，还得不断地追索、回味、再追索。

——帕森斯，“个人思想发展简述”
（“A Short Account of My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序 言

塔尔科特·帕森斯或许是 20 世纪社会学史上真正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之一。尽管他毕生努力落实社会学理论，使其不仅仅是在单纯描述一些乍看如是的社会事实，但人们却指责他依然没有能力将反思性融入社会思想。尽管他孜孜以求，要阐述在一个愈益具有多元主义取向的现代社会里，意义取向 (meaning orientation) 有着怎样的动力机制，但人们却指责他塑造了一堆带有机械论意味的系统，适合一个令人窒息的“美丽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尽管他本人致力于规划后纳粹时代德国的民主化政治方案，但人们却怀疑他庇护一个纳粹同情者进入了美国。尽管他从做博士论文开始就领略到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天才，此后更毕生自视韦伯主义者，但后辈同行们却认为他对韦伯（还有涂尔干）做了错误的解读，使人误入歧途，并屡屡尝试要将他们拯救出来，他不得不就此为自己辩护。

我之所以要撰写此书，旨在通过记述三件事情，让帕森斯的社会学著述更容易让人领会。首先，我希望揭示，帕森斯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乃至其后）的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明确的知识旨趣，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民主，这既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追求，也是一套分析—经验性的方案。

其次，我想要记述，伴随着美国历史各个时期的前后继替，这种对于民主的关注有哪些不同的表现形式。随着政治议程的变更，从新政开始，历经二战和麦卡锡主义，到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最后是 70 年代的水门事件，帕森斯都在就自己对民主的关注作出相应的修正。

再次，我想指出，尽管他在自己纷繁多样的分析中，对当时社会的诸般问题和解决之道一贯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但终其一生，有两项基本宗旨却是始终不易。其一是警惕功利主义（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交换理论，再到理性选择学说），其二是效仿韦伯建立的社会学的概念框架，不仅认为社会可以如此观

测,而且认为社会实际就是如此。这种概念图式设想了一套双翼的社会行动系统,在两极之间摇摆,受人偏宠的一极是(代表民主潜力的)整合,令人恐惧的一极则是(代表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危险的)失范。

帕森斯的著述包括十七部书,包括《社会行动的结构》(Parsons, 1937)和《社会系统》(Parsons, 1951)这样的世界级经典,另有发表在学术期刊和各类文集集中的两百多篇学术文章,并且屡屡被译成多种外语,在世界范围内收入各类文选反复刊行。不仅如此,哈佛大学档案馆(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中还收藏有大量书评、讲演稿、备忘录、回忆录、研究计划、研究报告、讲话,以及数量庞大的信函及其他材料。^[1]

这套著作体系蔚为壮观,但却让人难以深入把握,即使对于美国学者也是如此。乍看起来,帕森斯的思想风格乃是取自德国,当他在海德堡求学时,读到了韦伯的原版著述,那是他第一次发现了社会学。据说,当50年代的哈佛学生被要求至少掌握两门外语,作为申请研读社会学的基本要求时,有学生询问“帕森斯语”(Parsonese)是否可以算两门中的一门。在他公开刊行的著述中,他以典型的韦伯式风格,从一种现象或问题的高度一般化的特性,推进到其诸般经验形式(而对于方法论预设的勾勒又常常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不过,根据哈佛档案馆中保存的资料可以看出,他在逐渐熟悉一项话题的进程中的行文风格

[1] 本篇序言所使用的文献如下:Jeffrey Alexander,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Thought: Talcott Pars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Bernard Barber and Uta Gerhardt 合编, *Agenda for Sociology: Classic Sources and Current Uses of Talcott Parsons's Work* (Baden-Baden: Nomos, 1999); Max Black 主编,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1); Charles Camic 主编, *Talcott Parsons: The Early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Uta Gerhardt 主编,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3); Uta Gerhardt, "From Brave to New: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War Effort at Harvard Universi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25, 1999, 第 257—289 页;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7); Robert S. Holton 与 Bryan S. Turner 合著,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86); William C. Mitchell, *Sociological Analysis and Politics: The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7);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以及 Bruce Wearne, *The Theories and Scholarship of Talcott Parsons to 195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并不同于定稿中的步调。他在关注某一现象的时候,既考察有代表性的历史记录,也考察有代表性的分析性阐述和经验性阐述,然后再在自己的讲演札记或论文初稿(或前后数稿)中给出尝试性的分析架构,并反复修改。

绝大多数二手阐述仅仅依据公开刊行的文本来研究,像这样的做法,往往不能充分重视他的分析的背景,甚或抓不住他的分析的出发点。即使是像尤尔根·哈贝马斯这样杰出的论家,在《沟通行动理论》中既误读了帕森斯的治学之旨,也忽视了他的问政之心。而笔者此书则注重写作素材,讲演札记,或是帕森斯著述的各版草稿,以确保对它们的解读将(更加)充分。我将大量档案材料纳入了本书所使用的素材,注重分析帕森斯作品的四个核心阶段。我的目标是搞清楚,在他有关民主体制的社会学的分析中,主要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期间,逐步积累起怎样的成就。我希望在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中说清这位美国社会学家的伟大之处,以有助于重新理解他紧扣时代的社会学理论。

<xi>

当然,本书或许是站在一种欧洲立场上来写的。诸如此类的努力也许效仿了帕森斯在30年代的事业,那时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倡导当时称得上晚近的四位欧洲论家的学说,同时拒弃了斯宾塞式的自由主义,后者当时依然盛行于美国主流的社会学中。由此观之,笔者此书也许可以为当前对于帕森斯的诸多观点再添上另一种视角,力求通过一部思想传记来理解其著述体系,以补充许多现有的阐述。我打算基于一种大致上的欧洲立场,对一些已为人知乃至迄今人所未知的素材进行重新编排,以证明帕森斯的学术研究是如何得益于他的政治立场,并与之紧密关联,满怀热情地倡导民主体制。

世易时移,评价亦会随之转迁。从60年代早期以来,帕森斯主要是被描述为一位以系统理论(systems theory)为知识旨趣的理论家,与当时社会的政治保持距离。仅举数例,《帕森斯的社会理论》(Black ed., 1961)这一文集对他当时尚属创新的系统分析图式进行了重新概括,其中有些文章还给予了批评;《社会学分析与政治:帕森斯的学说》(Mitchell, 1967)严格基于政治学的角度,重新阐述了他有关行动和系统的一般理论[只讨论作为一名“不可救药的理论家”(incurable theorist)的社会学];《经典思想的现代重构:帕森斯》(Alexander, 1983)则认识到其著述分多个阶段,最终走向一个以“多维理论”

(multidimensional theory) 为特征的“晚期”，但却未能指出这种范式在其同时代的意涵，十章里有四章倒是在讨论据称是帕森斯的谬误之处。

80 年代晚期,《帕森斯 1951 年前的理论与学术研究》(Wearne, 1989) 一书开始认识到,帕森斯在宣扬社会理论的主张时绝非远离政治,但此书远远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此书描述了价值中立 (value-neutrality) 和政治自觉是如何构成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建构中的韦伯遗产。同时,《帕森斯论经济与社会》(Holton and Turner eds., 1986) 不仅回顾了他的韦伯主义立场,也回溯了他在医学社会学之类专门领域中的各种成就。最后,《帕森斯早期文选》(Camic ed., 1991) 和《帕森斯论国家社会主义》(Gerhardt ed., 1993) 证明,他的一些迄今未曾公开出版或基本无人问津的文本,讨论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诸多政治经济话题,视野宽广,论述深入。

本书将帕森斯的治学与其问政融为一炉。但基于美国思想史,这样的努力也应当符合韦伯的“价值无涉”(Wertfreiheit) [或“伦理中立”(ethical neutrality)] 的原则。不过,在我理解问政与治学的关联时,也可以采用另一种视角。文化史家弗里茨·施特恩 (Fritz Stern) 在其富于创见的《文化绝望的政治: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兴起》(*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 一书中,阐明了思想评论中常常被忽视的一面。这个方面或许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诸般思路。从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早期,德国学人从宗教虔敬或大众哲学等角度出发著书立说,认为置身愈益加速现代化的时代,他们的文化正处在衰落之中。施特恩提出,这就助长了国族主义 (nationalism), 因为这种论调预示了默认纳粹体制的克里斯玛式威权主义。在这种倾向下的文化悲观论就意味着,在时代精神 (Zeitgeist) 的疑似科学表现形式中,也隐含着政治。而在思想连续统的对立一端,否定诸如此类的文化绝望政治立场,无疑也是可以采取的一条道路。必然也存在着一种坚信社会进步的政治立场。这类政治将意味着倡扬民主体制,而这样的立场又寓于社会科学分析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式的世界观中,隐含着怀疑主义,传递着反民主的讯息,而拒斥这类讯息的政治立场必然乐于将民主体制理解成在现代社会的历史中不断演进。我认为,对于帕森斯来说,他的学术研究就体现出了这样

一种政治立场。不仅如此，我们将以丰富的材料记述，一旦需要，他就会作为一名活跃分子为民主事业而辩护，从未临阵踌躇。

早在阿默斯特学院读书时，年方 20 上下的帕森斯就十分明确地表现出这种远大抱负，要将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当问题在于将行为与道德相关联时，他对社会学中理论与事实之间关系的选择就放在了后者身上。他在一篇哲学课程论文中作出了如下论述，其措辞如实反映了他读过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 (William Graham Sumner)：

所有的理论都必须对事实作出说明，否则它们就毫无用处。理论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它就那些广泛综合、意义显著的事实作出了说明。如果出现新的事实，不能适合理论，那么就不是调整事实，而必须调整理论。民德 (mores) 是普遍迟滞的，一般总会达成后一种结果。我们关于社会进化和道德进化的理论也是如此。自从摩尔根和达尔文的时代以来，有大量事实开始为世人所认识，从而有必要对当时通行于生物学、社会学与人种学里的进化学说做彻底的修正。我们并不怪罪前人们的错误，我们认识到他们工作的价值，但我们并不视之为盖棺定论。我们知道的比他们多，因此我们的概括能够比他们更加全面、更加精确。我们显然负有责任，用我们所拥有的事实，让这些概括尽可能确凿，并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事实。这意味着勤勉精益求精的研究，但只要有一点儿有价值的东西，结果就是值得的。这就是我们所能说的一切。^[2]

帕森斯在其博士论文公开刊行的版本中，即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的头一篇 [这两篇文章其实是以连载形式出现的同一篇文章。——译者注]，探讨了符合严格地 (即便不是教条地) 以事实为基础的理论的社会观：“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不可能在我们现在所具备的基础上，持之以恒，打造某种更趋近于一个理想社会的社会……当然，在从

[2] Talcott Parsons, "Philosophy III. Professor Ayres. March 27, 1923. A Behaviorist Conception of the Nature of Morals", 第 23 页。参看哈佛大学档案馆, 帕森斯档案 (Parsons papers), 索档号 42.8.2, box 2。[本书下文有关档案材料将直接标示为“帕森斯档案”接索档号, 统一路径为“HUG-(FP)”。——译者注]

资本主义向另一种社会体系过渡的过程中，眼下的许多要素都会被铸入新的秩序。”^[3]

<xiii> 本书阐明了帕森斯是如何终其一生奉行这些观念的。整个故事将分四章来讲述，尽量为这位最伟大的美国社会学家勾画一部思想传记。这四幕场景各自凸显他的社会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中尤具创新性的一个阶段，整个过程跨越了四十多年。

第一幕，也就是第一章，基于他所反对的两股发展趋势，描述了他的第一部世界级经典之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是（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拒斥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拿来与之相对抗的是从韦伯和涂尔干等那里得出的意愿论（voluntarism）；另一种对抗冲动针对的是欧洲当时的反民主政制（特别是德国的纳粹体制），他针对这种政制，伸张三位（或四位）“晚近欧洲作者”，以及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后者是对抗纳粹主义的一种政治现实。

第二章中的一幕重点刻画了帕森斯如何主要在 1938—1945 年期间，作为公民，也作为社会学家，公开对抗国家社会主义。他对德国和美国的政制做了比较分析，突出各自的结构要素。他还说明了（韦伯所谓的）法理型（rational-legal）社会如何转变成克里斯玛强制型（charismatic-coercive）社会，而克里斯玛传统型（charismatic-traditional）社会又如何转变成法治国（*Rechtsstaat*）民主体制。因此，我认为，他一生中从未像这个时段这样，集中分析极权主义专制。他分析这种专制的功能运作，并拿它与其对立面——整合社会（即美国民主体制）——相比较。

第三章中的第三幕场景乃是基于他的第二部世界级经典之作《社会系统》，阐明它是如何关联着美国历史上的两个具体背景。一是哈佛大学的社会科学应战努力，一是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计划，通过“社会科学——一种国家基本资源”和“社会科学——一种国家资源”两份备忘录，与新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相关联。在《社会系统》中，帕森斯探讨了众多与战争及其后果明确相关的话题，包括原子

[3] Parsons, “‘Capitalism’ in Recent German Literature: Sombart and Web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6, 1928, 第 653 页。

弹的投放，他在讨论这个话题时，表面上是在谈科学之于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符号化(symbolization)]。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他明确致力于理解民主系统的功能运作，哪怕只是作为他眼中的前专制体制转型的典范，比如40年代在德国和意大利所发生的过程，有朝一日也可能发生在苏联。

第四幕，也就是第四章，探讨了帕森斯所判断的另一场转型。那就是60年代，当时的美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发育成熟的民主体制，为所有的阶级、种族(族裔)等等提供完整的公民权。他的新理论有了全新的出发点，开始考虑他认为属于近在眼前的那些创新成就。他提出了两套理论模型来说明民主体制。一是通过一般化符号互动媒介(generalized symbolic interaction media)，其不断累积、扩张的性质使帕森斯必须提出新的权力概念，以及其他三个一般化符号化媒介的新概念。另一套模型集中关注社会共同体[注意这个词的原文是“societal community”，不是“social community”。前者是社会层面上的，相对于超社会、亚社会之类共同体；后者是社会维度上的，相对于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译者注]，这种形态典型地体现了充分发育的现代社会中的民主体制。他觉得，这种新思路要求理论更换新名：“进化控制论”(evolutionary-cybernetic)。至此，他对民主体制的关注达到了巅峰。

<xiv>

在这套著述体系的所有四个阶段，从《社会行动的结构》开始，延续到60年代乃至其后，帕森斯对于民主体制的捍卫始终意味着，他看到了社会发展的两种相互对立的可能性：一种极端是失范(anomie)，另一种极端则是整合。当然，只有后一种意味着民主，尽管它也总是受到威胁，有可能坠入某种失范(例如麦卡锡主义)。这种双重聚焦使整合—失范这一区分成为某种变项。在他的思想生平的四个阶段里浮现出来的主题，标志着民主化进程的得与失(与复得)，正是这激发着他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与时俱进。

本书使用了一些此前公开刊行的材料，但经过了彻底的重新研究。第一章重新阐述了我在《社会学议程：帕森斯著述的经典源泉及其当前运用》(Barber and Gerhardt eds., 1999)这一文集中的文章里提出的观点。第二章乃是基于《帕森斯论国家社会主义》(Gerhardt ed., 1993)的编选前言。第三章进一步发挥了“从美丽到新：帕森斯与哈佛大学的战时努力”(Gerhardt, 1999)一文中的观点

[原书参考文献无此项,原文为“From Brave to New: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War Effort at Harvard University”。——译者注]。第四章则是全新之作。所有四章都补充了档案材料,使之融为新的统一解释,尽管其中三章的观点是此前以某种方式公开发表过的。

本书大大受惠于多方协助。其中,哈佛大学档案馆与哈佛图像服务处(Harvard Imaging Services)的帮助令人难忘。哈佛的欧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资助我多次作为合作研究者造访,这对完成本项研究至关重要。我还特别希望感谢阿比·柯林斯(Abby Collins)与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的支持。我感谢以下人士的讨论、指点、批评与鼓励: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京特·恩德鲁魏特(Guenter Endruweit),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马克·古尔德(Mark Gould),迪特尔·亨利希(Dieter Henrich),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rschel),芭芭拉·海爾(Barbara Heyl),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埃娃·卡哈纳(Eva Kahana),克劳斯-彼得·克平(Klaus-Peter Koepping),爱德华·莱曼(Edward Lehman),克里斯蒂娜·莱姆克(Christiane Lemke),唐纳德·莱文(Donald Levine),维克多·利兹(Victor Lidz),雷纳塔·迈因茨(Renate Mayntz),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斯文·帕普克(Sven Papcke),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安妮·罗尔丝(Anne Rawls),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尤斯廷·施塔格尔(Justin Stagl),爱德华·蒂利亚基安(Edward Tiryakian),哈维尔·特雷维尼奥(Xavier Trevino),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以及布鲁斯·沃恩(Bruce Wearne),等等。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玛丽·柴尔德(Mary Child)作为一名编辑,在许多方面堪为楷模。

我要对伯纳德·巴伯(Bernald Barber)致以最深切的谢意。五年来,我逐渐理解了帕森斯捍卫民主体制的社会学,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不仅是一位热诚的论家,也是一位忠实的良友。

本书敬献于他,以表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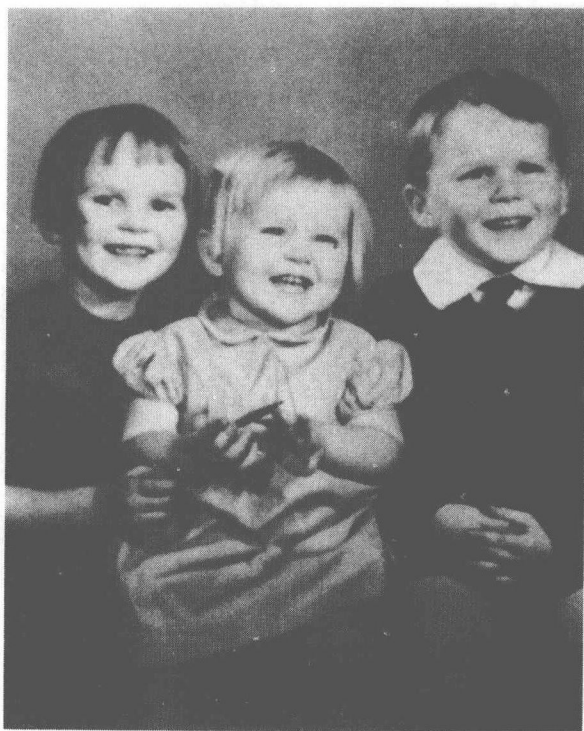
(1)

爱德华·史密斯·帕森斯 (Edward Smith Parsons, 1863—1943) 的祖上有一名成员地位显赫, 那就是爱德华·帕米列·史密斯 (Edward Pamelee Smith), 在南北内战时期尤利西斯·格兰特政府里担任美国印第安事务专员。他拥有神学学位, 在 20 世纪早期是社会福音运动成员, 该思想运动旨在调和当时资本主义下的生活状况与基督山上宝训中蕴含的伦理。他专研英文, 出版过弥尔顿研究专著。1919 年, 他被选为玛丽埃塔学院 (Marietta College, 位于俄亥俄州) 院长。有未经证实的传闻, 说在次年春天, 他和自己的小儿子塔尔科特曾去往德国旅行, 并在慕尼黑拜访过马克斯·韦伯。



(2)

玛丽·奥古斯塔·英格索尔·帕森斯 (Mary Augusta Ingersoll Parsons, 1863—1944)。她父亲是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3) 的曾孙, 母亲婚前名叫凯瑟琳·塔尔科特 (Katherine Talcott)。她和整个英格索尔家族都来自马萨诸塞州西部。玛丽·帕森斯成长于克利夫兰, 然后于 1889 年与爱德华·帕森斯结婚。据说她支持当时的进步事业, 甚至本人就是一位争取妇女投票权分子。她生有五个孩子, 塔尔科特是最小的一个。前四位分别是埃斯特 (Esther, 1890—1965), 查尔斯·爱德华兹 (Charles Edwards, 1892—1940), 伊丽莎白·英格索尔 (Elizabeth Ingersoll, 1894—1957), 小爱德华·史密斯 (Edward Smith, Jr., 1898—1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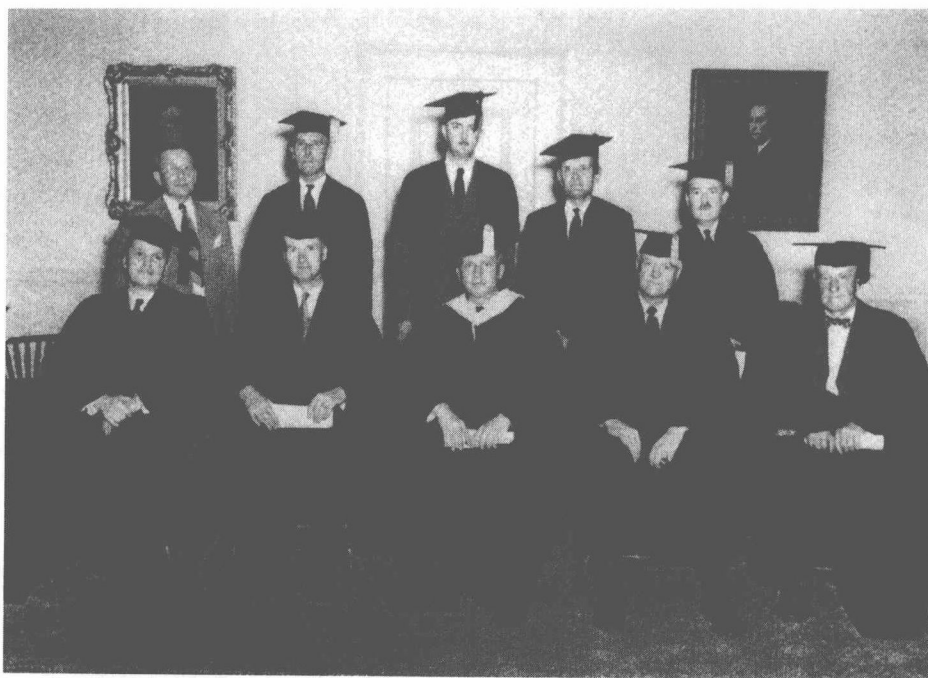
(3)

塔尔科特·帕森斯与海伦·帕森斯 (Helen Parsons) 的三个孩子分别出生于 1930、1933 与 1936 年。其中两位后来靠自己拼搏成为学者。他们最大的孩子，女儿安妮 (Anne)，后来成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她从索邦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在波士顿和意大利做研究，1964 年 6 月去世 [这位精神分析学者系自杀。——译者注]。儿子查尔斯 (Charles) 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哲学。2001 年，查尔斯受聘哈佛大学埃德加·皮尔斯哲学讲座教授。在埃默森堂 (Emerson Hall)，他的办公室恰好与其父 1965 年前的办公室同在一层楼。



(4)

帕森斯成长于一个大家庭。这张照片摄于1928年圣诞节，聚齐了帕森斯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父母亲，侄子和侄女，还有新婚燕尔的帕森斯夫妇。前排（左起）分别是：埃斯特·帕森斯（大姐），爱德华·S. 帕森斯（父亲）抱着琼·帕森斯（小爱德华·S. 帕森斯之女），玛丽·A.I. 帕森斯（母亲）抱着萨缪尔·帕森斯（小爱德华·S. 帕森斯之子），玛格丽特·艾伦·帕森斯（小爱德华·S. 帕森斯之妻）。后排（左起）分别是：海伦·沃克·帕森斯（1927年与塔尔科特·帕森斯结婚），塔尔科特·帕森斯，查尔斯·爱德华兹·帕森斯（众人敬重的大哥），伊丽莎白·I. 帕森斯（二姐），小爱德华·S. 帕森斯。海伦·W. 帕森斯曾经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美国研究生，在那里与塔尔科特相遇。塔尔科特后来转往海德堡大学（1926年7月结束），回到美国后，两人成婚。



(5)

1949年，帕森斯毕业二十五周年之际，接受了母校阿默斯特学院授予的荣誉学位。照片中，帕森斯站在后排最右边。1949年与帕森斯一起接受荣誉学位的其他教授是：(后排从左到右)巴茨(Frederic Marsena Butts, 1909届)，艾伦(Henry Butler Allen, 1909届)，赫宁(Frederick Waldbridge Hoeing, 1929届)，金曼(Joseph Ramsdell Kingman, Jr., 1924届)；(前排从左到右)索普(Willard Long Thorp, 1920届)，弗兰克斯(Sir Oliver Shewell Franks)，米特(Ralph Albert Van Meter)，肯德尔(Henry Plimpton Kendall)(均为1899届)。前排中央一位是科尔(Charles W. Cole)，马萨诸塞大学校长。在1950年前后的战后岁月，帕森斯正逐渐走向其前人难以企及的声名巅峰：美国社会理论的思想者。